

贸易新常态下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 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鞠建东

(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自冷战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了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并建立了与此相适应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随着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逐年提高,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本文以全球贸易新常态为研究基础,提出应建立与经济、政治结构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站在中国发展的角度提出“一带一路、三足鼎立”的改革开放新战略。

关键词:全球贸易新常态;一体两翼;三足鼎立;全球治理;华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17)02-0001-07

推进全球贸易增长是今年 G20 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然而,随着 2012 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国际社会及各界人士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进行争论。

1980—2011 年,全球 GDP 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9%,全球贸易同期增长率为 7.3%,是前者的 2.5 倍。而在 2012 年以后,贸易增长率连续 4 年跌到 GDP 增长率之下。由此可见,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2000 年,美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核心国地位,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15.48%,但到了 2015 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取代。且全球贸易结构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因此,国际全球贸易已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放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这决定了全球经济治理必将出现一个新框架,而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正从“G2”到“G1”再到“G3”转变,适应了这样的新要求。但是,在我国的外贸发展中仍有两大问题凸显:一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与产能过剩问题并存,刘易斯拐点已经或者正在到来;二是技术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通过自主创新来打入国际市场还存在诸多贸易壁垒。

为了适应全球贸易新常态和全球治理新框架,建立多元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开放新战略很有必要。为了解决中国外贸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也应寻找改革开放新战略。基于此,本文以全球贸易新常态为研究基础,提出应建立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及在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并站在中国发展的角度提出“一带一路、三足鼎立”的改革开放

收稿日期:2016-12-28

作者简介:鞠建东(1963—),江苏南通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放新战略。

一、全球贸易新常态: 增速转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

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 全球经济逐渐由旧常态转变到新常态, 旧常态下的经济可概括为三个特征, 即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 而新常态下的经济特征可概括为: 增速转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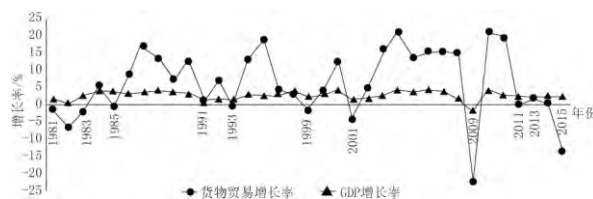


图1 1981—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和GDP增长率

从图1可以看出, 以2011年作为分界线, 在2011年之前, 全球贸易增速高于GDP增速, 大概是GDP增速的2~3倍, 但是2011年之后, 全球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

从表1看出, 2015年全球贸易和中国贸易增长率都为负数, 事实上, 2016年更是大幅下滑。

表1 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情况统计和GDP增速

| | 1980—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数据说明 |
|-----------------------|-------------|-------------|-------------|------------|-------|------------------------------------|
| 全球GDP增长率 | 2.9 | 2.5 | 2.6 | 2.6 | 2.7 | 世界银行 |
| 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 | 7.3 | 0.9 | 2.4 | 0.2 | -13.2 | WTO 按出口额计算 |
| 中国GDP增长率 | 10.1 | 7.8 | 7.7 | 7.3 | 6.9 | 世界银行 |
| 中国货物贸易增长率 | 15.9 | 6.2 | 7.5 | 3.4 | -8.0 | WTO |
| 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比 | 1995: 56.61 | | 2011: 63.75 | | | TiVA 按出口额计算 |
| 全球服务贸易占比 | 1980: 16.27 | 2000: 19.07 | 2012: 19.48 | 2015: 22.3 | | WTO 按出口额计算 |
| 前三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 | 1980 | 2000 | 2012 | 2015 | | WTO |
| | 美国: 11.73 | 美国: 15.48 | 美国: 10.44 | 中国: 11.92 | | |
| | 德国: 9.26 | 德国: 7.96 | 中国: 10.39 | 美国: 11.48 | | |
| | 日本: 6.61 | 日本: 6.51 | 德国: 6.87 | 德国: 7.17 | | |
| 是全球多少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 | 2000 | 2012 | 2014 | | UN Comtrade 各年数据覆盖的国家(地区)数量存在差别 |
| | | 美国(47/168) | 美国(29/161) | 中国(24/127) | | |
| | | 德国(22/168) | 中国(21/161) | 美国(21/127) | | |
| | | 法国(20/168) | 德国(18/161) | 德国(21/127) | | |
| | | 中国(4/168) | | | | |

一般来说, 贸易出现大规模的负增长有很大可能是由周期性的变化导致的, 虽然这种经济的下滑在一至两年之后会有所反弹, 但全球贸易以低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 是一种特殊的低速增长,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理解为是一种新常态了。出现这种情况有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全球贸易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从表1中可以看出, 2000年, 全球的第一大贸易国是美国, 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48%, 第二大贸易国是德国, 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7.96%, 第三大贸易国是日本, 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的6.51%。美国不仅是贸易第一大国, 而且贸易总量比第二和第三大国的贸易总量之和还多。

二是从“美国核心”到“三足鼎立”。表1也描述了全球有多少国家以该国家为最大贸易伙伴国。从过去数据来看, 从2000年到2012年, 美国一直都是第一大核心国。所以说, 全球贸易旧常态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但是2012年之后, 数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国。2015年, 中国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92%, 排第一位, 美国占11.48%。2014年, 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国的国家有24个, 是中、美、德三个国家中最多的。2015年, 中国不仅仅是全球贸易量最大的国家, 同时也是被当作是最大贸易伙伴国最多的国家。全球的三大贸易国家中, 第一大国已经从美国变成中国, 美国排第二, 德国排第三。这三个国家分属三个区域, 中国在东南亚, 美国在美洲, 德国在欧洲。总而言之, 全球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即由美国核心变成三足鼎立。

三是由中国驱动变成区块结构。全球最大的30个贸易国(地区)的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以上。1995年,贸易伙伴国(地区)的区位分布形成三个区域,即欧洲、美洲、亚洲。欧洲国家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国。在美洲,美国与加拿大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国。在亚洲,日本为最大贸易国,南朝鲜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可见,欧洲、亚洲、美洲之间有着一定的贸易联系(见图2、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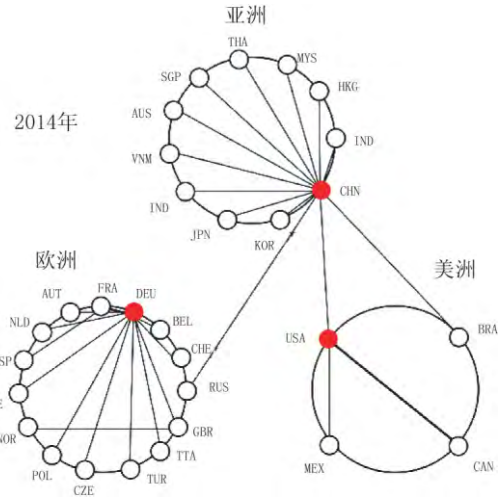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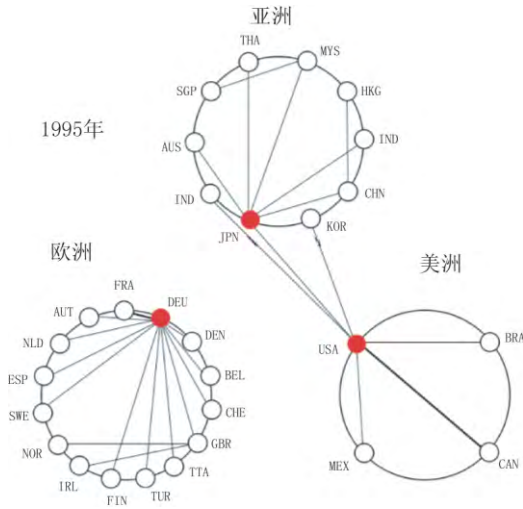


图2 1995年欧洲、美洲、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

图3 2014年欧洲、美洲、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

2015年国际贸易关系发生了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亚洲国家不再以日本为最大贸易国,而是以中国为最大贸易国;第二,亚洲的贸易大国与美洲之间的关系没有以前强,除了中国仍以美国为最大贸易国之外,日本、印度、韩国都以中国为最大贸易国,而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也在日益减弱,从2015年数据来看,全球贸易结构越来越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体现出三个价值链,即美洲、欧洲、亚洲价值链,虽然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但是慢慢呈现出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第三,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核心贸易国,是日本贸易量的3倍,从贸易结构上来看,从中国驱动变成区块结构。从图4可以看出,1958年,中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最为接近,两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2.33%和2.62%;1958—1993年,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于1993年达到峰值7.85%;1994—2015年,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并于2004年被中国反超。至2015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降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从数据上看,中国的贸易现状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区块结构都显示全球贸易逐渐转变为中国驱动。具体来说,有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最重要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大量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我国是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国家之一,日本有不到1000万的劳动力,而中国有8000万。所以,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市场对整个世界贸易的冲击是巨大的;第二,从技术上讲,贸易技术成本不断降价,例如集装箱技术、运输成本、高速公路、航运等,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国家;第三,贸易制度成本下降。关税与非关税成本下降,贸易利益的一致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从80年代开始,美洲、欧洲把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带来了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的浪潮,这本身也会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速度高于GDP的发展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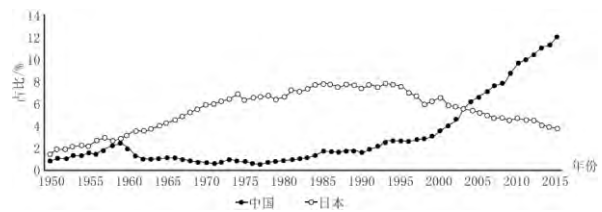


图4 1950—2015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量
在全球贸易量中的占比

然而,这4个因素在2012年之后都发生了变化。原因是:第一,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已经进入了世界资本市场,中国已不再拥有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的现象在减弱,虽然城镇化水平还不够,但是中国已经没有富余的低成本劳动力了。另外,低成本劳动力、剩余的劳动力和有效的劳动力三者概念不同,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成功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有效劳动力,但是还不知道非洲、印度有没有这种能力来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有效劳动力,中国的“一带一路”能不能把印度和中亚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带入世界市场,如果能够做到,这将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第二,新的技术,比如交通技术、网络技术、智能制造等,能否推进全球新的贸易浪潮还不能确定。通信技术一方面大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实物变得不再需要,所以新技术是否能够推进贸易增速大于GDP增速还不是很清楚;第三,全球主要贸易国家的利益不再一致,WTO自从2004年多哈僵局之后就止步不前,只要有印度、美国、欧洲、中国一起,谈什么都谈不下去,因为这几个国家的利益不一致。以前,美国把工厂转移到中国,这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现在中国技术进步了,能生产大飞机、航空母舰了,使得美国的利益受损。全球在WTO这一统一的框架之下,利益一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2011年之后,WTO就不再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成本的适度下降也遇到问题;第四,区域化的现象大大减缓了贸易的速度。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已经由美国转变为中国,但是,目前是以区域价值为主体,即分为欧洲、亚洲、美洲价值链,欧洲有欧洲的研发,亚洲有中、日、韩的研发,美洲有美国的研发,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贸易。这样4个因素推动了过去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样也造成了现在贸易增速的减缓。

二、从G2到G1再到G3: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所谓的新框架,指的就是现在的贸易格局已经不再是美国一超多强的G1,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而是三足鼎立的G3,即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洲。北美自由贸易区以美国为核心国家,欧盟以德国为核心国家,亚洲以中国为核心国家。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欧盟也存在种种不确定,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仍是不容小觑的两大阵营,与亚洲形成“三足鼎立”的框架。

面对这样一个新常态,全球治理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框架。首先对全球治理框架的演变历史做一个介绍:首先是G2:二战之后,由美、英、法等国指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很快演变为美苏对抗,美国成立了OECD,苏联成立了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组织,虽然两者的经济总量相差很多,但是由于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依然构成了全球两大阵营。1992年苏联倒台之后,两极对抗演变成G1:由美国所领导的G7盟国。1992至2008年是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运转良好,全球经济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迅猛发展,在这20多年间,美国慢慢进入了相对良好的全球治理体系。但是在2008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已经不再代表全球的经济总量。OECD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经济总量就超过50%,21世纪之后,由于中国的崛起,它慢慢降到了50%以下,所以它已经不再是代表新型国家了,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崩溃了。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近年来,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全球经济结构的区域化新特征催生出各种区域性的诸边治理体系。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美国为核心,欧盟(EU)以德国为核心。相比较而言,亚洲目前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碎片化区域经济合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成为深度一体化的关键性阻碍。首先,数据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东亚经贸的核心国家;其次,东亚地区以华夏文化为纽带,构建“华夏共同体”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与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政治关系是确定自贸区成员的主要因素。根据这些因素,以“华夏文化”为基础,以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为首批成员,在现有经贸联系的基础上构建“华夏共同体”,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循序渐进地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率先实现贸易和投资的深度自由化,进而追求关税和市场的高度统一,最后建立共同通用货币区。这一方案是基于当前经贸

基础的可行选择,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表2 北美、欧洲、亚洲主要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特征

| 地区 | 主要 FTA | 特征 |
|----|--------|--------------------------------|
| 北美 | NAFTA | 成员间几乎零关税;取消进口限制;鼓励投资、扩大成员间金融服务 |
| 欧洲 | EU | 成员间零关税、对外统一关税税率;经济、货币联盟;政治联盟 |
| 东亚 | 暂缺 | 双边、多边 FTA 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 |

表3 华夏共同体成员经济体的选择

%

| 经济体 | 国土面积 (万平方千米) | 人口 (百万) | GDP (百亿 现价美元) | 对中国贸易 依赖度 | 中国在其贸易 伙伴中排名 | 与中国的 政治关系 |
|------|-----------------|------------|------------------|--------------|-----------------|--------------|
| 中国大陆 | 963 | 1374.6 | 1086.6 | | | |
| 中国香港 | 0.28 | 0.06 | 4.6 | 50.6 | 1 | |
| 中国澳门 | 0.003 | 7.3 | 31.0 | 30.9 | 1 | |
| 中国台湾 | 3.62 | 23.5 | 52.3 | 22.7 | 1 | |
| 韩国 | 9.96 | 50.6 | 137.8 | 21.4 | 1 | 0.918 |
| 蒙古 | 156 | 3.0 | 1.2 | 62.1 | 1 | 0.919 |
| 朝鲜 | 12 | 25.2 | | | 1 | 0.919 |
| 新加坡 | 0.071 | 5.5 | 29.3 | 12.3 | 1 | 0.930 |
| 越南 | 33 | 91.7 | 19.4 | 19.7 | 1 | 0.952 |
| 日本 | 36.4 | 127.0 | 412.3 | 20.5 | 1 | 0.719 |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赖于各国主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社会群体乃至个人在共识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合作。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取决于以下4点要素:

第一,代表性。2015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个地区的GDP总和占全球的71.3%。与此同时,三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

表4 华夏共同体、欧盟、NAFTA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

%

| | 华夏共同体 | 欧盟 | NAFTA | 总计 |
|---------|-------|------|-------|------|
| 全球货物贸易比 | 22.6 | 32.2 | 16.4 | 71.3 |
| 全球GDP占比 | 14.5 | 26.2 | 23.8 | 64.4 |

第二,效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G20只有诞生出核心国家,才会成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如果由美、德、中首先在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再代表三个自贸区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继而由各自自贸区的成员国家在国际组织推动相关议题、执行相关政策,那么,这种“G3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将很可能开创一个更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争夺全球霸主的巨大利益诱惑使得美、中的G2体系通常不稳定。美、德、中的G3相对于G2,可能更加趋于合作。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

三、华夏共同体与一带一路: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战略是“一体两翼、三足鼎立”。一体,即“华夏共同体”,也即亚洲共同体。两翼,即“一带一路”,也就是以亚洲为主体,以“一带一路”为战略的对外开放新战略。

目前全球的对外开放形势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贸易增长趋缓。2015 年全球贸易的增速是 -19% 2016 年 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速均为负数。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已成为浪潮。从全球政治趋势来看,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已愈发明显。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从美国的战略以及贸易增速都能看出其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的外贸战略,即对外开放和全球化,是符合全球趋势的,也是符合中国的政治生态的。也就是说,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尽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美国,很可能得不到许多中产阶级甚至大部分人的支持,因为全球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中国自从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还是能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因此,如果有新一轮的全球化和对外开放,可能也应该是由中国主导。由美国或者欧洲主导的全球化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政治上的可能来继续向前推进,但是对中国来讲,既有利,又有政治上的可能性来继续推动全球化,在目前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下,中国应该高举全球化的大旗,继续推进对外开放,采取看起来危机四起的全球化形式,这是难得的战略机遇。继续推进以中国为主导来建立“三足鼎立”的世界贸易框架,同时,通过对外开放也能推进中国国内的发展。

我国现阶段外贸发展面临两大问题:

问题一: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与产能过剩问题并存。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日益枯竭,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口赤字”转变,刘易斯拐点已经(或正在)到来。同时,我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

当前我们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亚洲经济为依托,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为中国及沿线各经济体的经贸发展疏通出陆、海两条路。其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可转移至周边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基础设施质量、创造现代化工业发展条件的同时,亦可实现我国过剩产能的海外利用;最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油气战略合作,对保障我国生产中油气等能源的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二:技术升级的上升空间被发达国家压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在技术水平所处的层次来看,仍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然而,相较于亚洲地区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当前的技术水平已处于相对领先的位置,按技术级差排列工业发展的“雁行结构”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打造东亚乃至亚洲区域价值链的可行途径首先在于深度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在文化交融基础上加强经贸深度合作,建立“华夏共同体”,是为“一体”。

对外开放战略一般由五个要素决定:市场、技术、资本、非技术劳动力、技术劳动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五要素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78—2011 年,第二个阶段是 2012 年至今。从 2012 年开始,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五大要素禀赋在结构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新阶段下的新变化要求我国的对外开放呈现“一体两翼、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表 5 对外开放战略五要素的特征

| 要素 | 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 |
|--------|--------------------------|-----------------|
| 市场 | 以世界市场为主,国内市场为辅;出口为主,进口为辅 | 转而以中国市场为主 |
| 技术 | 尤其是核心技术以进口为主 | 转为以自主创新为主 |
| 资本 | 尤其是外资以 PDI 的流入为主 |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肩发展 |
| 非技术劳动力 | 非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 | 非技术劳动力相缺乏 |
| 技术劳动力 | 技术劳动力相对缺乏 | 技术劳动力相对充裕 |

“一体两翼、三足鼎立”是中国对外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的发展。华夏共同体推动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的建立,东亚国家的深度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中国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产业升级的完成,是开放战略的深度跃升,而“一带一路”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以及过剩产能的有效

利用和原材料的海外供应,是开放战略的广度延拓。

在全球贸易新常态下,由“一体两翼”的开放新战略奠定中国和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位,建立“三足鼎立、多元发展、合作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新框架,是中国在新阶段的改革开放战略,能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向繁荣。

(责任编辑:王顺善)

Research on new framework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under new normal trade and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strategy

JU Jiand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realized the free flow of the commodities and the factors globally, promoted the world economy and established the suitable world economic system. But with the unbalanc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position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the global trade has evolved from the old normal state of “High-speed increase, America-core, China-driven” into the new normal state of “Slowing down the speeding, Tri-pod stand, Regional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he new normal state of the global trade, this paper has suggested the theory of the suitable establishment of new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alyzed the new changes 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the two main problems in the trade, and put forward the new open innovation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Tri-pod stand” from the angl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normal state of global trade; One Body Two Wings; Tripod Stand; global governance; Chinese community